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书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携新书《周易与人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会。让听众在炎炎夏日与这本古老之书零距离接触。

寻找安身立命的智慧



□采访者 本报记者 杨新美
□受访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杨庆中

《周易与人生》分内外两编,由20个易学命题构成,讨论了《周易》的智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包含处世方法和德性涵养两个层面的内容,撇开后者只谈前者,则容易流于机心与游世;撇开前者只谈后者,则容易流于迂腐与拘谨。所以,本书内编讨论人生活动的德性基础,外编讨论人生活动的方法原则。前者可谓常中之常,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守持,以使自己保持并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后者可谓常中之变,可因时地的不同而有所变易,以使自己合乎并顺应时势的流转。现实生活中,只有有机地结合二者,才能使人显得既厚重,又智慧。本报记者在上海市书展期间,专访了杨庆中教授。

《科学时报》:我们现在读《周易》,学习《周易》,目的是什么?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杨庆中: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可以思考:第一个层面,了解《周易》的基本内容,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大有裨益。第二个

层面,学习《周易》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层面,也是我在《周易与人生》中所重点论述的,对于帮助我们安身立命,过正确合理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也正是孔子为我们探索出的一条学《易》之路。

孔子在晚年慨叹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夫子把学习《周易》的目的,定位在“无大过”上面,“无大过”就是不犯大错误。这是他的学《易》体会,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学《易》的目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探讨《周易》的智慧——少犯大错误的智慧,安身立命的智慧!

《科学时报》:学习《周易》对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有很大的帮助。是否像你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周易》的地位非常特殊?

杨庆中:的确如此。从汉代到清代,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周易》又被封为五经之首,是经学的核心。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周易》一直处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历代的哲学知识分子都以研究《周易》来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受到《周易》影响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不论是搞社会科学的、人文抑或自然科学的。如宋代大家欧阳修,实际上也是一位易学家;魏晋玄学理论奠基人、著名哲学家王弼就是通过注释《周易》,将儒家和道家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唐朝孙思邈也曾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建造地动

仪的张衡也用到《周易》;民间有水平的工匠也是易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受《周易》的影响,因而《周易》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哲学基础。

因此,关于《周易》的定位,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科学时报》:在世人看来,似乎《周易》只是一本算卦之书,这本流传了3000多年的古书是否还能古为今用?

杨庆中:实际上,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是易学家,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会运用成语。现在很多成语、词汇都是来自《周易》。如居安思危、穷变通久、自强不息、韬光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鼎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洗心革面、义结金兰等等。

当人们用成语时,就是用《周易》的智慧去解释一些现象。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是《周易》中的原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否极泰来是《周易》中的两个卦;有的是《周易》某句话中核心意思的概括和总结,“义结金兰”,这是来自孔子对《同人》卦的解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当股票跌到低谷时,有些股民会说“物极则反”,实际上这也是来自《周易》,是汉代易学家解释《周易》时得出的。再如“革故鼎新”,是由《周易》的“革”卦和“鼎”卦组成,革是变革,鼎是鼎立。革去旧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就叫“革故鼎新”。

所以,《周易》的智慧,我们现

在仍然在用,可以说是日日用而不知,由此可见,《周易》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它不是一本尘封的死书。

《科学时报》:“居安思危”是《周易》核心思想的总结,因而可以看做是一部忧患之作。《周易》中建议人们如何应对“安”和“危”、“好”和“坏”?

杨庆中:主要在于一个核心——“变”,即“防止变和促进变”,好的时候防止变坏,坏的时候防止变好。好的时候通过调试自我,戒骄戒躁,谦虚虚心。相反,在失败或遇到挫折的时候要懂得如何促变,如何把握时机寻找“变”的机会。

变的标准是“中”,即恰到好处;变的根据是“时”,即要因时而变。这是生活层面的智慧。此外,人们应该有生命智慧,就是乐天知命,“天人合一”。《周易》的说法就是顺应自然,不是宿命论,而是透过对自我的认识,去顺应外在的规律,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如一个人先天具有的天赋,通过后天的努力,将其发掘出来,就是做到了天人合一。实际上现在教育孩子,就可以用这个理念。

《科学时报》:从古至今,人们算卦的目的是趋吉避凶。不管它是否真的是算卦之书,不算算卦是否真的能够趋吉避凶,《周易》有没有可能让人们不占卜也能趋吉避凶?

杨庆中:有的。自孔子对其解释后,不占而能趋吉避凶的认识思路已经逐渐成为了《易经》的主流解释。今天读者们看到的《周易与人生》就是延续孔子这样的思路。让人们通过学习《周易》的思想,而做到趋吉避凶。通过对宇宙法则的理解,对个人生命体验,



《周易与人生》,杨庆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29.00元

对道德心性的一些修炼,实现一些趋吉避凶的目的。这是孔子之后历代易学家挖掘的主流。

《周易与人生》这本书至少可以引导我们透过对《周易》思想的了解,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生有合乎规律和法制的把握,当所有行动都合乎社会规律、合乎宇宙法则,合乎人生的法则,就不会再犯大错误,能趋吉避凶。

《科学时报》: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这本古老的“天书”,为自己所用?

杨庆中:《周易》之所以难读,是因为有其自己的体例,因此理解时,要合乎《周易》的解经方式。比较“经典”的《周易》注释类的书,读者们可以读一读。

研究《周易》还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不用通读一部书,只要读一卦,当把一卦读明白后,有兴趣接着读下一卦。因为《周易》的六十四卦结构形式完全一样,法则就一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去体会。抓住道理,就能对《周易》有比较好的理解。

另有一番看法。他并不认为贫民窟和繁荣的大城市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没有哪个大城市能够为所有人解决住房问题。城市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城市不仅属于富人的别墅区,也同样属于穷人的棚户区。对于贫民窟,作者认为政府应该适度容忍。

去年,唐家岭的“蚁族”问题充斥着媒体的头条,随后,又传出唐家岭新城的改造计划。对于“蚁族”来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还很难说。唐家岭的房子并不属于“蚁族”,而是属于“土著”。即使是廉租房,也要比原来房子的条件好。以租房为生的房主们,是不是愿意把新房还按照原来的低价租给“蚁族”们呢?如果廉租房不够多,而且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蚁族”们又失去了一处还离市区不很远的居住地呢?正如作者说的,什么采光、人均密度,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都是奢侈的。只要有电,有上下水,有煤气灶,就可以了。

此外,作者还谈到了城市中公共空间、垃圾、交通和水危机问题,从各个方面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城市,是一本既可以当做知识类,又可以用于消遣的城市学读本。

谢国忠为什么这样红



者目光的敏锐,观点的犀利。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素来对中国经济缺乏了解,又想尽快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现实中的热点问题,那么,这本书最值得推荐,作者已为他绘制了详尽的路线图。你可以不赞同他的某些结论,但他可以激发你的思考,在辩论中打开思路。

在当今经济学家中,谢国忠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他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或力挺,或反驳。这一影响并没有随着他“因个人原因”离开摩根士丹利而减弱,一个插曲也许有些读者还记得,

□金涛

对于世界上许多想去又未去的地区,阅读旅游读物不失为“望梅止渴”的捷径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孔之见。

如今,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旅游读物也是千差万别的,其中很多是翻译的境外旅游指南,其共同点是印刷精美、图片漂亮,景点介绍简捷而且到位,有精确的地图和对背包族特别需要的交通、食宿、银行、通讯等方面的资料,这是属于实用性很强的旅游向导类的读物。这类旅游读物已经和世界旅游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编辑方法已经程式化,大同小异。

另一类旅游读物,我比较喜欢的,则是属于旅游文学或散文随笔一类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留下了这方面的经典佳作,例如德国大文豪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

摒弃文字配以彩色照片的老套,而是别开生面地发挥作者擅长美术素描的功底,突出一个“手绘”的特色,将行者在旅途中所见所感的风景区、人物与名胜与房舍、街道与商铺、贩夫走卒与市井小民,乃至旅店饭馆的摆设与食物、衣饰与用具等,均用简捷的线条素描下来,作者的美术技巧虽然谈不上是一流的,但娴熟的功效,尤其是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感使她的美术作品有一种朴实而充满童稚的感染力,这种富有童趣的插图看似无心,对于读者来说具有吸引眼球打动他们的魅力。不论是小读者还是童心未泯的老读者。

作品的文字部分也独具特色。张佩瑜的几本旅游读物采用日记体裁,基本上按照旅行的日程逐一记下旅行路线、交通工具和沿途所见所闻,包括旅途遇到的麻烦和感动自己的事情,以及饮食起居等琐碎的

潘家园书话 旅游读物也能别开生面

果的《法国和比利时游记》,美国19世纪的文学大家欧文·华盛顿的《庄园见闻录》、《英伦见闻录》以及描写伊斯兰摩尔人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兴建的辉煌宫殿——《阿尔罕布拉》,类似的作品可以开出长长的书目。非常可喜的是,自从中国打开国门,开放海禁以来,许多爱好旅游探险寻幽访胜的年轻人,利用留学访问的机会,或者干脆作为背包客,深入到异国他乡,也陆续以鲜活的文字、真切的感受、独特的视角,为旅游文学增添了不少可圈可点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当然,恕我直言,在当前旅游文学炒得很热,这类图书大量出版时,也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题材重复,缺乏新意的美国图书竞相出版;另一个通病是缺少个性,内容抄来抄去,有掉书袋之嫌。一些旅游文学作品涉及某地历史沿革、兴衰存废、古代人物及建筑物特征,往往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示渊博。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些陈腔滥调摘自旅游指南一类小册子,这是写文章的大忌。

我在这里要特别推荐的几本旅游读物,是《土耳其手绘旅行》、《土耳其东部手绘旅行》、《伊朗手绘旅行》、《中亚手绘旅行》(乌兹别克、吉尔吉斯),这几本书均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5月推出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台湾的张佩瑜,一位喜欢美术又热爱旅行的年轻女教师(似乎是教地理的)。不久前我因病住院,这几本有趣的旅游读物陪伴我度过百无聊赖的日子。

旅游读物,依我看来,最显著的特色是阅读起来很轻松,这正如旅游本身是放松身心的休闲活动一样,旅游读物也应该是轻松愉悦引人入胜的。张佩瑜的几本旅游读物,可以说得上是典型的轻松愉悦的佳作,它们最大的特色是一改旅游文学过去约定俗成的模式,



“手绘旅行绘本”(全4册,中亚、伊朗、土耳其、土耳其东部),张佩瑜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130.00元

细微末节,粗看起来颇像“流水账”,由于写得很真实,没有虚假和空泛的议论,使人读来特别亲切。作者并不特别青睐知名度很高的历史遗迹,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的风土民情特别关注,特别是作为东方女性的背包族,独自闯荡比较封闭的伊斯兰教国家,她的敏锐的观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的妇女,深入社会底层的特殊经历,不仅以其独特的视角给人以新奇和感动,也有力地澄清了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解。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瑜的几本旅游读物在编辑方面也是颇具特色的,它们一反套用印刷字体的老传统,全书都采用作者的手写日记直接制版,所附地图也用作者手绘的地图,真正做到“手绘”。虽然没有印刷体那样干净、标准化,却以“手绘”的随意和拙朴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这不能不佩服出版社编辑的大胆和独到的审美情趣。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旅游读物也能别开生面。

□王聪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在全国轰轰烈烈宣传世博会的时候,在对这一口号耳熟能详的时候,在认为城市生活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不禁要问,对于熟悉的城市,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当人们一旦习惯了某样东西,往往就丧失了去了解和探究这样东西的兴趣,比如说城市。城市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城市?有多少种城市?城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好处、哪些危机?读过郑也夫撰写的《城市社会学》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城市那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

这本书有三个特点是我非常欣赏的,其一,通俗平易的语言,这应该是郑也夫的风格之一,《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具有同样的风格;其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于通俗图书的深度;其三,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体现出了学术本身道不远人的价值。研究学问,无非就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进而能够解决周围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社会学者更为重要。这二点分开来看,都不是难点,但是能够综合到一本书上却是非常不易,平易的语言很难表达出深刻的理论,而深刻的理论往往容易陷入远离生活的抽象世界。做学问难,能把学问做活,更难。

城市的产生过程

在《城市社会学》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城市的产生过程。作者认为王权是城市产生的主要推力。城市出现之始,即使从平均的水平上来看,人类社会还不足以支撑手工业的兴起,但是由于王权的存在,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这就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其他服务,从而吸引了农业之外,其他行业的人来王权周围定居。城镇因此出现了。这一点参照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城市一定是政治中心,以各级爵府所在地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但是为什么西方的城市看起来都是以商业为中心呢?作者通过简明的证据说明,在罗马帝国末期,北方蛮族入侵之前,西方的主要城市与王权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蛮族把西方原有的文明洗刷殆尽之后,城市从此衰落了。因为封建王朝的首府都设在了乡间,不过贵族在城市里还拥有城堡。衰败的城市只能由教会来守护。随着经济的好转,商人阶级出现,并渐渐地聚集到城市的附近。但是由于商人地位不高,贵族们不许商人进入城市居



《城市社会学》,郑也夫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定价:28.00元

住。商人们只好住在城边,人慢慢地聚集多了,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原来的城墙之外,又修建了一道城墙,形成了外城。随着商人的财富越来越多,贵族势力的日渐衰败,越来越多的贵族离开内城的城堡卖给了富裕的商人,返回乡村。这样,城市就逐渐从王族转移到商人的手里。

城市中世俗生活的恢复,以及管理上的真空,要求来此谋生的人自己管理自己。商业行业中的首领,或多或少地承担起了第一部行政工作,富裕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城市的管理者。

在此,作者又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同乡会,以说明行会与同乡会的区别,以及他们在城市中起到的不同功能。在当时的西欧,奴隶是不允许自由流动的,如果能够逃亡到城市,并且3年内不被发现,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因此,逃亡的奴隶不会宣扬自己从哪来,以减少被抓到的几率。但是在中国,人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一个地方的人为了减少当地人对自己的歧视,避免不公正的待遇,更愿意结成同乡会,为同乡的举子、商人和其他人提供帮助。

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人物,还联系中国的现实,介绍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此产生的独特问题和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户籍制度?为什么当年的人们那么重视城市户口?

户籍制度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在作者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

城市化的问题时,对户籍制度的产生原因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要减少消费,首先发展重工业。由于掌权者的目的是一要工业化,要实现强国梦。为了提高发展的速度,掌权者首先考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轻工业不就更好发展了嘛。在计划经济下,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生产和消费,只有少消费,多积累,才能结余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再投资。重工业产生于城市,而城市只有保持很少的人口,才能减少消费,户口制度由此产生。另一种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生产效率低,物质资源有限,因此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消费要求,那就是城市人。为了保护这部分人,只好选择户籍制。

当年的知青之所以做梦都想回到城市,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出生地的感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户籍与特权和补贴挂钩。这相似的一幕,在朝鲜还依然存在。据朝媒体称,在不久前的世界杯上,由于球员郑大世表现优异,朝鲜政府给了他很多奖励,其中最具诱惑力的一项奖励就是解决平壤户口。为什么一个户口这么重要?因为户籍与能享受的国家分配直接挂钩,对于朝鲜人来说,贵比黄金。在当年的中国,户籍制的背后,是一个票证大系统。它通过票证来分配有限的资源。当年,票证是有价的,为什么有价?说明政府的收购价低了,是照顾了城市人,剥削了农民。近些年,政府一号召城市反哺农村,重视“三农”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全国更均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村在国家发展之初作出的贡献予以补偿。

在当年,户籍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城市农民工的问题。作者援引2006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结果,以采矿业为例,农民工的比重是65.7%,采矿业真正上岗的工人中,农民工可能占80%~90%,乃至更多。也就是说某些工业领域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按照工作的类型来看,他们应该属于产业工人,但是从户籍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农民。因此,只得产生了“农民工”这一词汇来形容这类人群。农民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城市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作者认为,为这种歧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来城市打工只是半合法,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在2003年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之前,农民工随时有可能作为“三无”人员被遣

送回原籍;第二,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工在择业上受限制,而且不能贷款;第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享受同等的权利,被拖欠工资的事例时有发生;第四,子女入学问题,城市的中小学只为具有城市户籍的人提供教育的位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在付出了辛苦努力之后,为什么还会接受这么低廉的工资呢?作者认为,原因在于这一代农民工的参考系。他们的参考系不是一起工作的城镇工人,而是依然生活在农村的亲戚朋友。相比于他们,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不会再把参考系定在农村,而是直接与城市的同龄人作比较。由此,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一旦廉价的劳动力不再,中国的经济又如何保持快速的发展,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户籍制度是存是废的问题,作者给出了多种观点,以供参考和讨论。

对于改造城市贫民窟,作者也

□杨哲宇

我似乎有义务为《再危机: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写篇书评。2007年以来,在从前的《财经》杂志和现今的《新世纪》周刊杂志上,谢国忠的专栏是由我负责编辑的。那天,在财新传媒从书新书发布会上,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暗暗一惊:不知不觉间,这个专栏的文章已经可以出这么厚的一本书了!同时,心头也暗暗掠过一丝自豪。

有必要透露一点“内幕”。作者的文章发来时,是用英文写就的,需要由我的同事译成中文。参与其事者甚众,书中译者名单后面那个“等”,其实浓缩了许多辛苦的劳作。我再对照原文,细细修订译文、欣慰的是,作者数次表达过对译文的满意之情。

不过,专栏文章时间固定,不能断档,因而不可能做到篇篇精彩(服过这种笔役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有时接到原文后,心里会一沉:“这个话题他不是写过了吗?是不是谢郎才尽了?”但是,别急,接下来,他总能交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章。

此次出书,我得以全面系统地重读这些文章,不能不承认,自己过去对这些文章的分量还是估计有所不足。回顾这几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进程,你不能不佩服作

“不可接触者”似的,是浅薄的同义语。他们对传媒与学术的不同社会功能显示出惊人的无知,因而枉自尊大;他们更无法理解,严肃的媒体与学者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增进人类对所处世界的认知。那些有更高理解能力的人有责任为公众穿透迷雾,照亮前程。换言之,一名学者有没有水平,与他是否爱与媒体交往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上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与媒体的关系整体是融洽的。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贝克尔、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众多学者都是乐于、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有的甚至长期辟有专栏。贝克尔曾深情地感谢为媒体撰稿如何改进了他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他的表达能力。

不必说,谢国忠尚不能跟这些大师比肩,但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他不是、可能也不愿成为一名经院经济学家,那种生活将把他与充满激情与魅力的现实世界深深隔离。人类社会也不需要过多的钻在螺蛳壳里制作着精致的数理模型,但对金融危机先是毫无觉察继而一筹莫展的经济学家。

未来的人们未必会铭记他的哪一篇文章,但无疑会记住这个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出混沌经济世界的人。